

香港的跨境「包二奶」現象 與社會福利界的回應

馬麗莊
譚少薇

香港亞太研究所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香港的跨境「包二奶」現象 與社會福利界的回應

馬麗莊

譚少薇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作者簡介

馬麗莊博士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譚少薇博士為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

鳴謝

作者感謝香港特別行政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屬下的研究資助局資助本研究項目（研究計劃項目編號：CUHK4349/01H）。

© 馬麗莊 譚少薇 2007

ISBN 978-962-441-182-9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香港的跨境「包二奶」現象 與社會福利界的回應

引言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包二奶」問題衝擊香港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困擾不少已婚婦女，對她們的身心 and 感情都造成很大的傷害。「包二奶」現象不單影響受害女性的精神健康，也影響當事人的整體家庭生活。

「包二奶」這社會現象的出現，主要因為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隨著祖國經濟政策開放，製造業北移，不少香港的工人和管理人員需要北上工作。根據香港綜合住戶統計調查，香港市民北上工作的人數，由1988年的52,300上升至2003年的238,200。以整體勞動人口計算，1988年北上工作只佔1.9%，在2003年躍升至7.4%。在北上的勞動人口中，以男性居多（78.1%），有67.7%北上工作的男性屬於30至49歲這個年齡組別（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03:12-13）。基於不同的個人需要（Young and Kwan, 1995），及地緣和經濟因素，部份在內地工作的男性，在國內「包二奶」，建立第二個家。

本地社會服務機構也開始察覺到前來求助的服務對象，受著「包二奶」問題困擾的個案為數不少，求助者的次數顯著上升。舉例來說，香港明愛婚外情問題熱線，從1996年接收的17,204個來電，增加至2001年的21,596個，增幅達25.5%。而有關婚外情輔導的個案由1997年7月至2002年9月，共有2,886個（香港明愛婚外情問題支援服務, 2003）。

回應、紓緩和解決社會問題，是社會福利在現代社會的重要功能之一。「包二奶」的行為，本是私人情感糾紛，屬於私人領域，能否視之為公眾事務，授權予政府通過政策加以干預，社會上仍是爭辯不休。對何謂社會問題，社會學家 Rubington及Weinberg（1989:4）有以下的定義：社會問題是指一種情況，它與社會上一定數目的人的價值觀念有所衝突，而人們皆持相同的意見，認為需要用集體行動改變此情況。

根據以上的定義，「包二奶」可以被界定為社會問題。第一，它在1994年11月至1995年5月間，受到大眾傳媒廣泛報道和討論（Tam, 1996）。第二，「包二奶」與香港自1971年在法律及社會道德基礎上建立和認可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有著明顯的價值衝突。第三，從社會服務機構接獲求助的問題類別及數字顯示，為數不少的已婚女性，正受此問題困擾，需要尋求專業人士協助（香港明愛婚外情問題支援服務, 2003）。然而，也有持反對意見者，他們質疑受困擾的人數是否已足夠代表公眾利益。「包二奶」究竟算是個人問題還是社會問題，仍然需要大家再深入討論。

無論如何，不爭的事實是，面對服務使用者的要求，本地社會服務機構在過去幾年已發展了不同的服務，積極回應此社會問題。現在正是適當時候，檢視社會福利界對「包二奶」問題的回應，以及對受影響人士所提供的支援。以下兩組問題，都值得我們探討和思考。第一，對「包二奶」這個問題，本地社會服務機構在服務上有何具體回應？他們認為受困擾家庭的服務需要是甚麼？針對這些需要，他們向這些家庭提供了甚麼服務？採用了甚麼服務和介入手法？這些服務能否發揮助人的效果？

此外，社會服務的設計、發展和執行，有賴社工的推動，他們對「包二奶」的看法，與機構的回應是息息相關的。因此，以下第二組的問題亦不容忽視，它們包括：本地社工如何

理解「包二奶」這個社會現象？其成因和影響是甚麼？在解決此問題上，社工可以作出甚麼貢獻？

對社會福利界來說，這兩組問題都非常重要；然而，過去這方面的答案都是空白的。本地有關「包二奶」的研究（Kwok, 1995; Young and Kwan, 1995; Tam, 1996），並未嘗試作全面探討。為了填補這處空白，我們在2003年進行了一項有關「包二奶」問題的研究，其中一部份嘗試了解社會服務機構對此社會問題的具體回應。本文嘗試運用此研究的結果，解答上文提出的兩組問題，檢討服務現況，並提出新的發展路向。

文獻回顧

「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制度，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根深蒂固，古時在天子、諸侯貴族、士大夫及商賈間普遍通行。有云：諸侯「一娶九女」，天子則「一娶十二女」，而《禮記，曲禮下》載：「士有一妻、二妾。」（祝瑞開，1999:118）然而，自秦漢以來，一般平民百姓，由於經濟條件的限制，只能行「一夫一妻」制。因此，在中國傳統思想裡，三妻四妾素來是男性身份財富和地位的象徵。

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轉變，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漸漸消失，香港於1971年在法律上正式廢除此制度，取而代之的是「一夫一妻」制，成為社會上合法合情的婚姻制度。在現今的香港，「包二奶」被界定為婚外情，這社會現象自然不為法理承認。根據Young及Long（1998:223）採用的定義，所有涉及在婚姻以外的性交往，皆被視為婚外情。Glass及Wright（1992）認為涉及感情的投入才算得上是婚外情，而Pittman（1990）則認為婚外情的界定，是夫妻兩人主觀訂定的，其定義主要取決於個別夫妻互相訂立的婚姻契約。以上西方學者對婚外情的界定，建基於近代西方社會廣泛接受的「一夫一妻」制度，其不

足之處是，這些界定並沒有考慮到「包二奶」行為背後蘊含著中國「一夫多妻」制的傳統文化因素，甚至可視為此制度的復辟（Tam, 1996）。

除了文化因素外，香港的跨境「包二奶」現象隱藏著內地與香港由於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帶來兩地生活水平差異、兩性權力失衡的狀況。內地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婦女，遇上到內地工作經濟條件較佳的香港男性，試圖通過傳統對男性的溫柔、依附、從順和委身，去保障個人生活，改善家庭經濟狀況。「二奶」的依附、從順和委身讓內地工作的香港男性感受到在兩性相處時位高權重的滿足感，他們不惜背負留在香港的妻子，包養內地的女姓。

在這種社會文化背景下，我們在研究裡對香港和內地跨境「包二奶」的現象採納以下的定義。第一，香港的男性在內地的地方，與內地的女性建立一種或多種比較長期或固定的男女親密關係；第二，香港的男性向內地的親密女性提供物質和生活費等經濟資助；第三，香港的男性與內地的女性建立同住或同居的關係。「包二奶」的關係與偶發性的婚外情或婚外性不同之處，是前者重視固定的關係，並往往牽涉居住安排和撫養的責任，而後者只是隨意和不固定的。

社會服務機構可以在三個不同的層面上，回應和處理「包二奶」的社會問題。第一個層面是預防，其目的是剔除危機因素，避免問題產生和出現。第二個層面是當問題已出現了，需及早發現、及早介入，希望能及時糾正或解決問題，恢復正常。第三個層面是減低因問題糾纏下去引致的不良後果，譬如對孩子及配偶的傷害等（Caplan, 1964）。

對兩性關係、性與婚姻，香港社工在意識型態上深受猶太基督教和傳統中國文化影響，相信性、愛、婚姻是不可分割互相連結的，他們傾向不接受婚姻以外的性和愛，並視之為越軌行為（Hsu, 1985）。在回應和處理跨境「包二奶」衍生的家庭問題時，社工們能否超越個人心理層面的理解，洞悉持續此間

題的社會歷史文化因素，從而對症下藥，譬如改變兩性權力不平衡的從屬關係，鼓勵婦女建立獨立於父權主義家庭以外的社會身份等（曾家達, 1986）。

社工的介入手法粗略可分為微觀（Hepworth, Rooney and Larsen, 2002）和宏觀的介入法（Netting, Kettner and McMurtry, 1998）。微觀的介入法包括個人、家庭和小組輔導、資源換配和統籌等；而宏觀的介入法則包括政策倡導、法律制訂、社區教育。我們關心的是，香港社會服務機構在有關「包二奶」這個社會問題上，服務提供時選擇在哪一層面介入，其介入手法以微觀為主，還是以宏觀居多？

研究方法

是次調查採用了量化及質化的方法，包括一次問卷調查及兩次聚焦小組討論。兩次聚焦小組的參與者分別為現職社工及社工學生。問卷調查的資料採用SPSS整理和分析。

在樣本選擇方面，問卷的調查對象是在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服務資料叢書裡2001年的註冊機構會員。至於社工聚焦小組對象，是提供家庭服務及婦女服務的現職社工，由我們發信邀請服務機構派代表前來參與。社工學生的聚焦小組方面，我們向本港七間提供社工訓練的大專學院社會工作學系發信邀請作為物色在學學生參與。樣本參與的結果是：在問卷調查方面，共發出325份問卷，收回問卷共155份，回收率47.7%。當中有26份問卷的受訪機構對受「包二奶」現象影響的人士及其家庭，一向提供所需服務，因此被選出進行分析。在這26份問卷中，20份來自非政府機構，6份來自政府機構。以服務類型分類，22份是家庭服務，2份是婦女服務，2份屬於非家庭及婦女服務。現職社工聚焦小組共招募11位參加者，來自5間社會服務

機構不同單位；至於社工學生，則包括來自4間大專的8位即將畢業的主修社工的同學。

研究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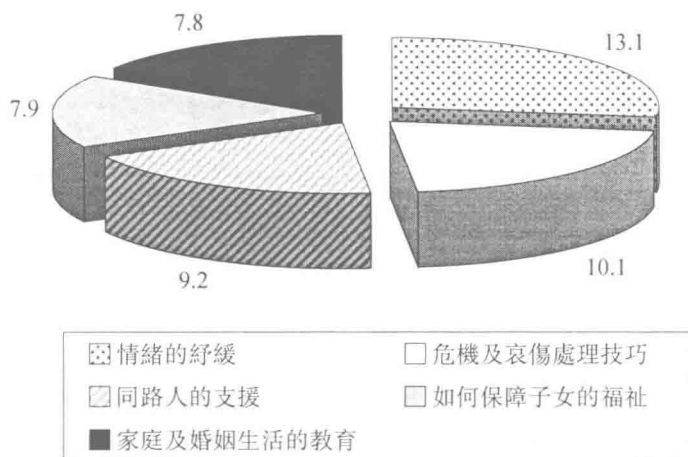
社會服務機構投放於包二奶問題的社工專業人員

在收回的155份問卷中，只有26份問卷顯示該機構或單位為受跨境「包二奶」問題影響的家庭提供服務，約佔總數的17%。儘管如此，這不等於有專責社工協助受「包二奶」現象影響的家庭及個別人士，上述情況可從當中數字反映。在是次問卷調查中，個別機構擁有最多的社工數目是500人，最少1人，平均數是43.4人。至於專責處理受「包二奶」影響的家庭個案的社工數目，個別機構最多的是131人，最少的是1人，平均數是15.6人。當我們比較機構的社工總數及專責服務受「包二奶」影響人士的社工數目，發現當中有11間機構（42.3%）並沒有指派專責社工處理因「包二奶」產生的服務需要。換句話說，全部社工都有機會被指派參與相關服務，但沒有專司此職的社工。反之，15間機構（57.7%）則有指派專責社工去處理「包二奶」的問題。比較兩者的平均數時，我們發現是次寄回問卷的機構中，每2.8名社工中，便有1名需向受「包二奶」問題影響的家庭提供服務。這樣的社工數目，既提供個案輔導、又要同時推行小組及社區教育等多元服務，是否足夠？

一、機構認為受影響家庭有何需要

至於機構認為受「包二奶」影響家庭的需要，在我們提供的14項選擇裡，首5項的排序是：情緒的舒緩（平均分 = 13.1分）、危機及哀傷處理技巧（平均分 = 10.1分）、同路人的支援（平均分 = 9.2分）、如何保障子女的福祉（平均分 = 7.9分），以及家庭及婚姻生活的教育（平均分 = 7.8分）（由0分代表完全不需要到14分代表極之需要，見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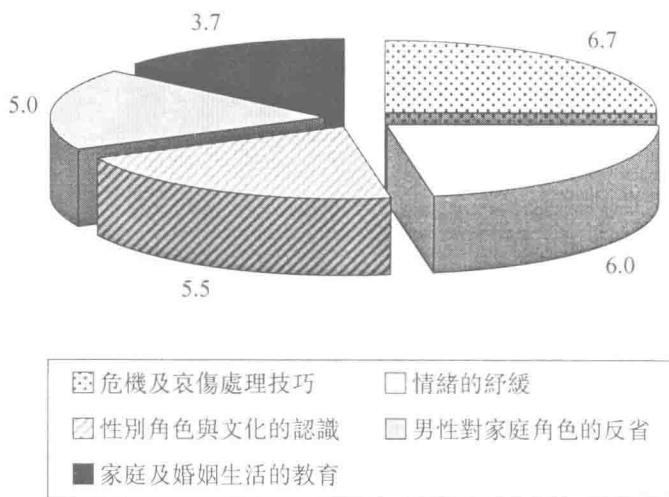
圖一：機構認為受「包二奶」影響家庭的首5項需要



針對服務對象的需要，在我們提供的10項選擇中，受訪機構認為在知識和技巧方面，專業社工提供服務時最需要增強的首5項依次序排列是：危機及哀傷處理技巧（平均分 = 6.7分）、情緒的紓緩（平均分 = 6.0分）、性別角色與文化的認識（平均分 = 5.5分）、男性對家庭角色的反省（平均分 = 5.0分），以及家庭及婚姻生活的教育（平均分 = 3.7分）（由0分代表完全不需要增強到10分代表極之需要增強，見圖二）。

巧合地，「情緒的紓緩」和「危機及哀傷處理技巧」均是受訪機構認為受影響家庭最需要，以及現職社工有待增強的知識和技巧。由此可見，目前這些個案都是危急的，當中帶有很多負面或被壓抑的情緒未被紓緩，需要優先處理，而且需要社工多花時間及額外的資源去加強技巧訓練。此外，受訪機構也指出，家庭及婚姻生活的教育亦需加強。此類教育的需要，與性別角色與文化觀念有關，尤其是男性的性別角色如何回應社會轉變而作出調適，更需要通過性別教育加以改善。

圖二：機構認為社工最需要增強的首5項知識和技巧



二、機構介入的手法

(一) 微觀社會工作介入

1. 小組服務：根據受訪機構表示，對受跨境「包二奶」影響的家庭或個別人士提供的服務形式，以小組服務為主，當中以支援小組和成長小組最多機構採用，佔小組整體的35.0%。其次是治療小組及自助小組，各佔27.0%。在提供可選擇的5項小組形式中，服務使用者以女性為主，平均參加次數是5.5次，反觀男性的平均參加次數是3次，女性參加小組的頻率幾倍高於男性。雖然小組的參加者以成年的女性為主，其實，這些小組也有為受影響的子女而設的，當中以服務13歲以下的子女為主，平均參加次數是2.8次，其次是13至18歲的年青人，平均參加次數是1.6次，最少的使用者是18歲以上的子女，平均參加次數只有1次。由此可見，子女年紀愈大，便愈少使用有關服務，因此，得到有關的服務也愈少。

2. 個案輔導及熱線服務：是次調查顯示，92.3%的受訪機構（24間）都以提供個案輔導為主，只有42.3%的受訪機構（11間）提供熱線服務，個案輔導是倍多於熱線服務。個案輔導的使用者以女性為主，使用次數的百份比是88.5%（可選多項），男性則是57.7%，值得一提的是男性使用的百份比與夫婦共用的百份比相同，同是57.7%。研究數據顯示，使用這兩項服務，仍以女性為主，「包二奶」的男性在使用個案輔導和熱線服務方面，似乎較女性被動。

（二）宏觀社會工作介入：社區教育

問卷調查顯示，在我們提供的6種社區教育形式中，社區教育整體的平均使用率是28.5%。受訪機構最普遍使用的形式是講座或論壇（53.8%），其次是展覽及派發材料（42.3%）和接受傳媒訪問（34.6%）。當中，每月的使用頻率與整體使用頻率的排列一致，以每月舉辦講座或論壇最多，有12次，其次是展覽及派發材料，共10次，及接受傳媒訪問共9次。無獨有偶，社區教育的對象以女性為主，其次是大眾（沒有特定性別），再其次是夫婦。無論以何種形式出現，現行的社區教育方法似乎都較被動，通常是被邀請或在事件發生後作回應為主。主動的介入如政策倡議在6種可供選擇的方式中排行尾二，可見社區教育的形式十分局限。

（三）理想的服務模式

問卷以開放答案方式詢問機構「最理想的是以何種方式提供服務」，由受訪機構自由填寫。這題共收到17份意見，佔可供分析問卷的65.4%。我們用重點字分析，可供分析數量有31項，結果列於表一。

傳統的服務模式如個案輔導、小組及社區的教育工作仍是主流，然而，也有機構漸傾向跨境服務及一站式服務。這種轉變與香港和內地交往頻繁、因北上工作出現的分隔家庭，以及「包二奶」問題日益嚴重有關。事實上，「包二奶」的行為確

表一：最理想的服務方式（%）

個案輔導	19.4
公眾社區教育	19.4
小組模式（同輩及同路人）	16.1
跨境服務	16.1
一站式的（多元或整合的服務）	12.9
其他	16.1
合計	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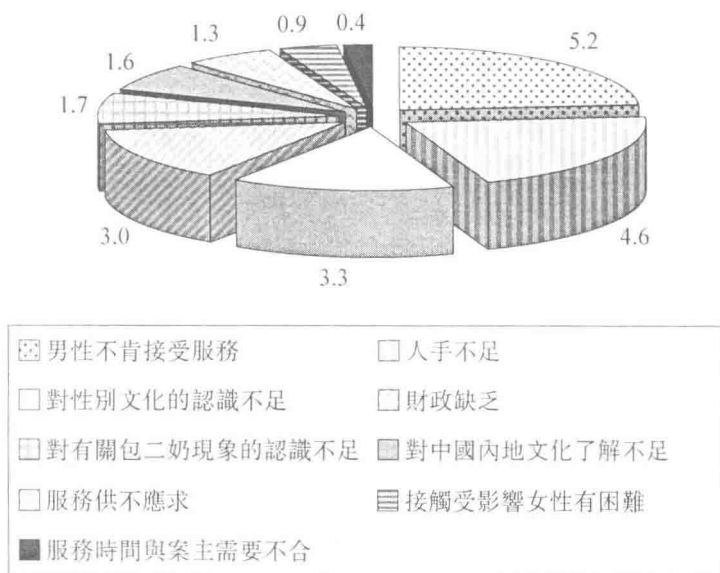
實製造了香港和內地兩個家庭，衝擊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模式。其他意見還包括建議對「二奶」展開外展工作，以及新來港非婚生子女提供服務。此二者現時或未開展，或剛剛起步。

三、機構推行有關服務的經驗

是次調查發現，有超過一半的受訪機構（53.8%）表示已達到服務的目標。雖然我們沒有明確查問機構達到了甚麼服務的目標，但我們或許可以從他們現行提供的服務，再加上同工聚焦小組的內容加以探討。我們發現，機構的服務目標大抵是協助服務對象處理情緒，釐清問題及對問題找出恰當的處理方法。

然而，在自評不能達到目標的機構中（42.3%），受訪機構認為不能達到目標的原因，在可供選擇的9項中的首5項依次序為：男性不肯接受服務（平均分 = 5.2分）、人手不足（平均分 = 4.6分）、對性別文化的認識不足（平均分 = 3.3分）、財政缺乏（平均分 = 3.0分）及對有關「包二奶」現象的認識不足（平均分 = 1.7分）等（由0分代表不重要到10分代表最為重要，見圖三）。

圖三：機構自評不能達到目標的原因



四、社工對「包二奶」現象的看法

受訪者異口同聲地肯定這現象的普遍性及嚴重性，擔心會造成更多的離婚、單親個案，以及新來港非婚生子女，以至領取綜援個案增加等。

同學A：「包二奶」事實上太普遍了。對男性來說，「包二奶」可以是人有我有，在這種心理驅使下，他們很容易去嘗試。

同學B：年青人的口頭禪是北上尋歡旅行。他們這樣的順口溜，反映問題嚴重，為甚麼會這樣？我想與傳媒大肆報道有關，傳媒一方面提醒我們這個問題的存在，同時也把它描寫得刺激吸引。

同學C：「包二奶」這問題，責任不一定在於國內女性。她們透過傳媒，得到一個印象：香港甚麼都好；加上在國內工作的香港男性，也喜歡吹噓自己。

社工一：「包二奶」的個案，大約佔我平常處理個案的三分之一。

社工二：它佔我平常一半的工作量。

受訪者擔心的是傳媒在「包二奶」現象中扮演著推波助瀾的角色，當中誇張失實的報道，不但令未經歷過的人想去嘗試，同時也建構錯誤的男女角色期望，這才令社會福利界憂慮。

五、社工認為跨境包二奶的原因

（一）環境因素

受訪者指出，由於香港與深圳毗鄰，加上香港工業北移，愈來愈多香港男性北上工作；或因內地消費低，而北上消遣娛樂，因而增加香港男性接觸內地女性的機會。

同學D：男性通常都因為工作關係，要常常返回內地，很自然想有另一個家，養情婦、「包二奶」，通常都是因為工作關係，大家互相接觸多了而發生的。

（二）兩性如何面對環境轉變

1. 「包二奶」的男人不顧後果：

社工三：一開始時，男性都沒有深思熟慮，只是逢場作興而已，不過一路發展下去，慢慢有了感情，便需要處理。

社工三認為跨境「包二奶」的男性在最初接觸內地的女性時，未必想到包養的關係，只是想消遣娛樂而已。當有了感情瓜葛時，男士經常低估了在香港以外建立另一個家庭的複雜性及帶來的危機。

2. 男人對性及英雄感的追求：

社工一：[我同意]環境是決定因素。男人逐漸覺得第三者都好慘，希望保護她，假如離開她，她會自殺，因而泥足深陷。性生活方面，太太跟第三者比較，男人的經驗是不同的。有一位男性這樣形容太太，待她要像皇帝一樣，但跟第三者在一起時，則覺得自己很重要。

從以上論述，不難發現香港男士對太太與「二奶」有著不同的表現和感覺，男性期望在內地女性身上展現的英雄感或享受性服務的感覺，充份反映「男尊女卑」的期望，並以此增加男性的自信及價值。

3. 身處異地，香港男性與內地女性同是寂寞人：

社工四：我曾經處理過一宗個案，是從湖北到深圳工作的女性。她在特區沒有根，而在情感上有所需要，她希望心有所屬。

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產生了很多流動勞工。他們在異地面對調適的困難，到內地工作的香港男性與離鄉別井到深圳來的內地女性，很容易產生心理上的認同。加上生理上的需要，香港男性在寂寞及性需要的驅使下，便可能與內地的女性發生感情或性關係，這是環境的誘因。

4. 香港女性條件好，男性未能「高攀」：

同學E：香港女性教育程度高，要求高，她們很了不起，站在男性角度，找太太為了尋求安慰和得到自尊，不希望女性那麼有能力。

此外，香港與內地兩地的環境亦塑造了不同的女性氣質。在受訪者的眼中，香港女性在社會地位、教育水平和經濟的獨立能力上都比內地女性強，因此，不排除有些香港男性在英雄

感及優越感的驅使下，選擇了在內地社會地位、教育水平或者經濟獨立能力都比自己遜色的內地女性作為包養的對象。

（三）朋輩的影響

社工五：環境因素是重要的，不是每一個人都那麼自律。在陌生的環境中，人很容易把自己的價值和倫理觀拋諸腦後，當你的朋友十居其九都「包二奶」時，你沒有這樣做，才是不正常。

參與小組討論的社工相信，朋輩及同儕在跨境「包二奶」的決定上，影響著在內地工作的男性，他們互相比較，而且樂於將這些私事公開，以表現男性的能力及身份。同儕的影響是身份認同的結果，有助肯定男性的價值。對於這些男士而言，「二奶」被物化，即能提升價值——擁有愈多「二奶」及有能力週旋在眾「二奶」中，代表男性的能力及地位愈高，「包二奶」遂成為一個象徵符號。

包二奶現象的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包二奶」行為愈來愈複雜，受影響的人數也愈來愈多。

社工一指出，她負責的個案中，不乏有自殺傾向的人，她們多是丈夫在內地「包二奶」的香港妻子，通常在獲悉丈夫的越軌行為後，便會試圖自殺。她們雖然有些會拖延自殺行動，但過程中往往承受很大的精神和情感傷害，並會愈來愈強烈。社工一說：

我處理過的個案中，受害女性告訴我為甚麼試圖自殺，除了失落的感覺外，就是「不甘心」，例如配偶往往把責任推在她身上，說他出外尋歡，完全是她造成，她除了感到